

## 去激进化和反恐怖主义的媒体策略

Anat Hochberg-Marom 博士

**摘要：**圣战主义等极端意识形态的扩散已成为全球政府和社会关注的主要问题。了解激进化进程是开发去激进化工具的关键步骤。激进化和去激进化都是复杂、多方面的过程，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平台和数字营销技术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分析了伊斯兰国（ISIS）熟练使用媒体策略成功进行大规模激进化的过程。基于从此分析中得出的观点，我提出了一种有效的去激进化进程的概念框架，其中包含了创新的构架方法。

**关键词：**去激进化，激进化，极端主义，圣战主义，反恐怖主义，框架化策略。

### 1.引言

近年来，恐怖袭击和相关暴力行为的扩散和升级，受到极端主义意识形态通过极端化过程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的推动，对全球安全构成了严重挑战。<sup>1</sup>

在本文中，我所指的是激进化，是指采取一种极端主义信仰体系的过程，该体系鼓动、利用暴力和恐怖主义，使得暴力和恐怖主义合法化，从而以实现社会政治变革。基于在暴力发生之前进行干预的软实力方法<sup>2</sup>，和关于预防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P/CVE）<sup>3</sup>的论述，本文探讨了媒体在此过程中的作用，尤其是框架化策略的运用，提供了一种去激进化的策略框架。理解激进化对于创建该框架至关重要，需要探索作为一个相互关联的信念体系的潜在意识形态。这种方法的基本前提是，改变个人的思维方式和看待世界的方式，以及他们感知和解释现实的棱镜，会导致他们行为的改变。<sup>4</sup>

激进化可能与各种运动和意识形态有关，包括右翼、超民族主义和新纳粹团体<sup>5</sup>，但是我在本文将重点介绍全球圣战（圣战主义）的意识形态，它是激进化、极端暴力和恐怖主义的先驱。

自美国 9/11 恐怖袭击以来，尤其是在伊斯兰国（ISIS）崛起之后，激进化这一话题一直是全球政府和社会关注的主要问题。在此期间，圣战恐怖组织和各种其他极端主义团体越来越多地利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平台煽动激进化，即激发、鼓动和招募追随者，发动袭击并煽动激进化暴力。

这些激进化行为已经成功地吸引了来自各种背景的个人，包括那些相对收入稳定和富裕的人群。比如说，一名来自马来西亚的女医师移民到伊斯兰国家；<sup>6</sup>在印度尼西亚第二大城市泗水，一个有四个孩子的家庭共同实施了三起恐怖袭击；<sup>7</sup>几个来自斯里兰卡富裕家庭且受过高等教育的个人在该国实施了致命和毁灭性恐怖袭击。<sup>8</sup>

“激进化”是一个备受争议的术语。尽管“暴力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圣战主义”在政治和媒体话语中根深蒂固，但是这些术语及其与激进化的关系仍然存在争议。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经常被描述为激进化进程的最终结果，而圣战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极端的宗教意识形态，改变了人们和社会，尽管这种改变并不总是一致的。人们常常用激进的圣战思想来形容它，它要求对其他宗教或世俗意识形态、价值观和身份的影响进行全面战争，被称为“思想战”。<sup>10</sup>

在政治学文献中，激进化经常被用来指代通往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或原教旨主义，甚至更普遍地说，证明使用暴力合法化的途径或进程，以伊斯兰国（ISIS）<sup>12</sup>和基地组织<sup>13</sup>为首的全球圣战运动为例。这一进程是高度个体化的，并且始终与情境有关，因为参与暴力极端主义的途径和动机是多种多样的，相互交织在一起。

在本文中，我把激进化与个体意识改变的过程联系起来，也就是说，他们采用新的思维模式和解释方式，从而导致新的行为。<sup>14</sup>具体而言，激进化涉及采用激进的信仰体系，该体系反驳温和的主流思想的合法性，证明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合法性，并促进其发展。

相反地，去激进化是指使个人从极端的信念、价值观和地位转向温和的主流信念体系的过程。考虑到应对这一转变的框架和视角的多样性，以及在“思想战”背景下有关“极端思想”的居多文献，除去激进化之外，研究还发现了另外两个相关的过程：

- 脱离接触——使激进的个人脱离极端主义活动，而不必激怒他们或改变他们的观点的过程；<sup>15</sup>

- 反激进化——为防止中立个人被极端主义或恐怖组织招募和激进化而采取的具体措施。<sup>16</sup>

这三个过程都具有共同的思想和方法。它们的确切性质以及确切原因和发生的方式是进一步研究和讨论的主题。出于本文的目的，我们把这三者都称为去激进化。

在当今全球互联互通、界限模糊的时代，人们可以轻松地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平台交流和分享想法，而暴力极端主义、圣战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激进化，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社区的重大威胁。这种互联互通使得个人比以往更有可能接触极端主义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例如圣战主义），同时促进了与其他极端主义分子的知识与实践交流，从而加强了意识形态的立场和观念，并导致进一步的激进化。

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兴起，使诸如伊斯兰国（ISIS）和基地组织之类的全球恐怖组织更容易地向更多的人宣扬极端主义思想和观念，使他们变得激进化并招募他们。通过网络吸纳圣战者思想的许多年轻人能够轻松地与圣战者团体和数字社区的成员进行直接交流。这种互动促进了更紧密、更密切的关系的发展，并以极端的想法促进了信任和认同——最终（有时是迅速）导致真正招募入组织并积极参与暴力和恐怖袭击。因此，制定有效可行的去激进化战略已成为许多国家的当务之急。

研究表明，实现激进化的关键因素是影响公众意识，<sup>17</sup>（如下所述）而这一意识可使用框架方法有效地实现。本文旨在进一步了解激进化进程，重点对伊斯兰国（ISIS）的构架方法进行了分析，并提供了一个新的框架，通过社交媒体对抗恐怖主义、暴力极端主义和圣战主义，利用框架化技术破坏恐怖主义的煽动。本文介绍了框架化技术新的和创新的定义（好战/和平框架化、威胁框架化、符合性/不符合性框架化、传统/革命性框架化）以及现有技术（例如受益/损失框架化），并从圣战意识形态的四个主要方面考察了伊斯兰国（ISIS）的运用。

在下面的章节中，我将对伊斯兰国（ISIS）试图推行的价值观、目标和战略信息进行分析，以影响公众舆论，促进激进化——换句话说，塑造对其圣战主义教义的看法和支持。这一分析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地缘政治和数字媒体环境的背景下，正确理解伊斯兰国（ISIS）的话语和框架化策略，将大大提高我们制定去激进化策略和计划的能力，从而打败激进化。

## 2.激进化进程和改变观念

激进化是一个复杂且不断变化的过程，可以采用多个方面和形式，包括使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持续时间有所不同。在某些情况下，个人会秘密进行这一过程；在其他情况下，他们则公开地和集体地煽动激进化。<sup>18</sup>

人们发现，各种各样的社会、政治、经济、宗教、心理和其他动机因素以及背景情况会影响任何特定个人的激进化，从而导致他们采纳极端主义。特地是，关于激进化的先驱者存在大量的文献，对可能导致暴力行为的社会政治因素和其他环境因素进行了识别和探索。政治和社会经济边缘化、贫困和失业；对身心的忽视；遭受暴力侵害；先前的创伤；先前的犯罪行为；以及疏离、决绝和绝望的感觉都被认为是激进过程中的重要因素。<sup>19</sup>同样，动荡和不确定的时期和局势为激进化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最近的冠状病毒流行病我们可以看到，各阶层的极端主义团体试图利用人们的恐惧和关切来推进自己的激进化议程。此外，研究还考察了接触宗教教义在圣战分子激进化中所扮演的角色，一些人受到宣扬暴力的神学计划和

领导人的影响，而另一些人则在家里被灌输思想，受到他们的社区和同龄人的影响，接受了激进化价值观。

此外，社交媒体的普及在激进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互联网普及率和社交媒体使用率很高的国家和地区，例如东南亚，为激进化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例如，印度尼西亚拥有近 1.4 亿个 Facebook 用户，在世界任何其他国家中排名第三，马来西亚的 81.4% 的人口使用社交媒体<sup>20</sup>。根据 RSIS 在 2018 年 6 月发布的报告，<sup>21</sup> 加入伊斯兰国（ISIS）的马来西亚新成员中有 75% 处于激进状态并通过社交媒体招募激进分子。马来西亚警方报告说，当地激进极端分子已经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虚拟网络，由全球圣战的支持者（包括激进组织和年轻个人）组成，为整个地区的组织提供联系，包括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文莱、菲律宾、泰国和柬埔寨的组织。

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伊斯兰国（ISIS）在东南亚大量穆斯林人口中开展的数字营销工作竭力传播其圣战者思想；使个人和团体变得激进并煽动他们实施暴力行为；建立和培养志趣相投个人的虚拟社区；并与招募的新成员进行沟通，对他们进行洗脑。它还寻求获得广泛的公众支持和同情，筹集资金，并提高其组织形象<sup>22</sup>。

就伊斯兰国（ISIS）而言，在被确定为潜在激进化的诸多因素中，社会政治异化尤为重要，我将在下一节对这一因素进行详细探讨，在下一章中将单独探讨宗教背景，即关于伊斯兰国（ISIS）的圣战意识形态。

## 2.1 社会政治异化

激进化的一个主要因素是社会政治异化以及缺乏同化和融入更广泛的社会。对某一特定种族、宗教或民族群体权利的剥夺和歧视可能导致羞辱和可耻的经历，并加剧受害的感受。

23

社会学和心理学理论认为，受辱的个人寻找可以修复这些负面情绪并恢复其重要感受的途径。这种倾向使遭受边缘化和歧视的个人更容易受到极端主义团体的信息的攻击，这些信息宣扬恢复失去的自豪感和地位的思想体系，给压迫者造成痛苦和折磨，甚至使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合法化<sup>24</sup>。此外，来自这种背景的个人往往会受到社会纽带和互动的严重影响，在遭遇个人危机或生活变化时或在特别严峻的环境可能特别脆弱。因此，诸如伊斯兰国（ISIS）之类的招募人员能够利用这些漏洞，提供社交经验（即使是在线经验），以促进与该群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种归属感、被理解、被接受甚至受欢迎的感受，是激进化进程中的关键因素。<sup>25</sup>

研究发现，来自中亚的伊斯兰国（ISIS）的新成员有很大一部分人陷入了贫困和经济不确定性之中，生活在深深的社会疏离感和孤立感中。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在俄罗斯作为劳务移民时被招募的，他们的经济和社会边缘化使他们受到伊斯兰国（ISIS）的热情欢迎。根据《金融时报》的估算，<sup>26</sup> 最初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伊斯兰国（ISIS）新成员中，有 80% 至 90% 在俄罗斯寻找工作时经历了激进化。

对于这些新成员来说，加入伊斯兰国（ISIS）并非出于虔诚的伊斯兰仪式或信仰。相反，正是他们的社会和经济边缘化以及他们的沮丧和愤怒促使他们加入 ISIS，移民到伊拉克和叙利亚，甚至对西方发动恐怖袭击。例如，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一名移民于 2017 年 4 月在斯德哥尔摩发动袭击<sup>27</sup>；2016 年 6 月，来自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三名移民在土耳其的阿塔图尔克机场进行了自杀式袭击<sup>28</sup>；以及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移民于 2017 年 11 月在纽约进行了恐怖袭击<sup>29</sup>。

对激进的穆斯林社区的研究表明，激进化需要将极端主义的思想与信念与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或同事紧密联系在一起<sup>30</sup>。尽管人们普遍认为，人们之所以加入伊斯兰国（ISIS）（或其他圣战组织）仅仅是因为他们认同伊斯兰国（ISIS）的意识形态和行为，而事实是，这种

意识形态的认同是远远不够的，个人对圣战者社区（或特定圣战者群体）的强烈认同感和归属感是他们愿意为此牺牲生命的决定性因素。事实证明，成员资格和人际关系是激进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 3. ISIS 的意识形态

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解决伊斯兰国（ISIS）激进化成功的原因，审查其圣战主义至关重要。对伊斯兰国（ISIS）而言，激进化是影响穆斯林公众意识的一个过程，这种极端的信仰体系反驳了现有的主流的伊斯兰教解释，证明了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合法性。伊斯兰国（ISIS）的圣战者思想的核心是进行不懈和坚定不移的斗争，以清除伊斯兰教的任何外国影响、意识形态或价值观。

#### 3.1 ISIS 的圣战思想的起源

伊斯兰国（ISIS）于 2014 年进入国际舞台，目的是在由阿布·巴克·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领导的哈里发统治下，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其宗教权威。在其圣战意识形态的驱动下，伊斯兰国（ISIS）的领导人竭力树立信誉，确立合法性并将其教义强加于所有穆斯林。他们巧妙地利用社交媒体和网络技术进行大规模激进化煽动和招募，对全球公众意识产生了巨大影响。

全球性圣战的意识形态，或称“圣战主义”，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作为基地组织在阿富汗对抗苏联的一部分，于上世纪 80 年代创立并得到巩固<sup>31</sup>。它建立在对七世纪伊斯兰的极端主义宗教解释之上，将十八和十九世纪的萨拉菲主义传统与扎根于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政治文化的实用概念结合起来。<sup>32</sup>

圣战教义呼吁对穆斯林意识进行彻底的改革，以清除伊斯兰教的外国影响和价值观，推翻现有的政治宗教世界秩序，并在当今腐败的异教徒社会的废墟上建立一个模范的穆斯林社会，作为新世界秩序的一部分。它要求对伊斯兰的完全信奉和信仰；拒绝任何非伊斯兰的概念、观念、身份或忠诚；证明了没有规则或限制的全面武装斗争的合法性，以推进其信仰体系。

伊斯兰国（ISIS）意识形态中的一个关键要素是乌玛（ummah），它是理想的穆斯林集体和社会的乌托邦式概念，自伊斯兰诞生以来，它本身就是伊斯兰的核心价值，深深植根于 18 亿穆斯林的心中。从一开始，伊斯兰国（ISIS）宣扬的目标就是通过建立一个新的、纯粹的、集体的穆斯林社会，在一个强大的、真正的、完全建立在对伊斯兰教法的解释之上的伊斯兰国家来实现这一理想。

#### 3.2 ISIS 的意识形态与思想战

对伊斯兰国（ISIS）而言，圣战是该组织的核心宗教价值、指导原则和实质。在它看来，圣战不是为控制特定领土或人口而进行的政治、军事或民族斗争，也不是在穆斯林世界之外在媒体上经常看到和策划的战略传播或公共外交斗争。相反，这是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意识两个方面进行的全面斗争。

首先，圣战是一场关于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战争，一场针对世俗和非穆斯林原则（例如民主和民族国家）的“思想战”，既在国际舞台上，也在虚拟舞台，即互联网平台、社交媒体和暗网，进行了实战。其次，圣战是一场心灵和思想的战争，感知和认知的战争，为世界上 18 亿穆斯林的所拥有的真正穆斯林身份进行的战争。因此，它否定了任何与自己的意识形态不符的“异教徒”身份或忠诚，并禁止与其对伊斯兰的严苛解释相抵触的任何概念。

在进行这场战争时，伊斯兰国（ISIS）的领导人受到坚持圣战主义思想作为其核心信仰和生活道路的鼓舞，并将其强加于全球所有穆斯林。他们呼吁穆斯林公众与外国价值观，特

别是世俗主义、民族主义和多元主义，以及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民主价值观作斗争，所有这些价值观都被认为是伊斯兰的敌人<sup>35</sup>。的确，对于伊斯兰国（ISIS）而言，从政治意识形态的角度而言，思想战是一场多方面的战争，旨在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政治权力并影响全球公众意识。在本文的背景下中，我们将圣战主义的形式视为一种散乱的斗争，现在通过框架化的角度来呈现。

#### 4. 框架化作为激进化的媒体工具

尽管存在关于恐怖主义组织使用媒体的大量文献，<sup>36</sup>恐怖主义学者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媒体，特别是意识形态框架化对激进化进程的影响。鉴于数字媒体的发展以及恐怖分子采用各种营销策略和媒体策略的程度，了解他们如何促进自己的视野和激进的意识形态并传播其价值观和信息，从而实现其思想和政治目标，这一点至关重要。使用的主要媒体策略之一是使用框架化。<sup>37</sup>

框架化是影响公众舆论的重要战略工具，也是争取包括激进组织在内的各种非国家参与者政治权力斗争的组成部分。<sup>38</sup>

框架化是一个“诠释包裹”，提供概念、说明、符号和视觉图像，作为上下文线索来理解潜在的含义和内容，同时也增强了口头或非语言文本对说服过程的影响。<sup>39</sup>这些包裹用于特定实体（例如恐怖组织）向特定行为者传达某些社会政治问题的目的性解释，该实体希望影响与该问题有关的信念和/或行动并动员支持。

框架化涉及选择感知现实的某些方面，并通过组合叙述突出它们之间联系的叙事，使它们在传达的信息中更加突出，以促进特定的解释。<sup>40</sup>选择和强调现实的某些要素可以简化、构造和确定事件或现象的特定解释或重要性，并且可以将注意力集中在它的特定方面，同时转移了其他人的注意力，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公众的情绪，调动了支持响应。<sup>41</sup>

因此，采用框架化方法的策略参与者会尽力强调特定的观点，就定义和与当前政治话语和社会现实有关的意义的建设进行斗争；换句话说，他们将进行一场“思想战”。框架化通过使用不同的框架来影响公众舆论并操纵感知和相关情感，成为一种获得政治力量的思想历程。对于恐怖主义组织而言，它们天生就参与了对解释和意识形态叙事的竞争，框架化是一种战略工具，可宣扬其理想和意识形态，传播其激进的价值观念并鼓励其目标受众在特定场合以他们的世界观进行思考、感受、表现或行事，包括使用暴力。<sup>42</sup>

在“思想市场”中竞争的恐怖主义组织<sup>43</sup>在其多媒体活动中使用了多种框架化技术，<sup>44</sup>以及说服策略和操纵方法，将公众话语转向他们狂热的意识形态的方向，并增强公众对他们学说的认同和支持。他们运用这些技术来放大信息，从而促进激进化，招募新成员，使其意图和行动合法化，向组织成员传达其意识形态以及巩固对其规范、目标和运营的基本支持。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以不同的方式使用不同的框架，使得他们可以清楚地定义自己的身份，塑造并投射出有力的形象，并创造出一种二分法，将自己和自己的思想与对手的思想区分开来。

伊斯兰国（ISIS）通过结合主流媒体、创新的视听媒体和在线平台，以复杂而熟练的方式来计划框架化，以高效的方式传播其意识形态并促进暴力行为，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发挥最大作用。它成功地使数百万的追随者和支持者变得激进化，创建了一个基于其圣战主义教义的全球数字化圣战社区。伊斯兰国（ISIS）为恐怖主义媒体注入了新的活力，并进行了大量创新，从而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媒体形式，以实现极端恐怖分子的目的。通过这种方式，它通过广泛地结合文字和视觉内容，包括高质量的插图、视频和信息图表，将叙事和乌托邦理想主义的形象与残酷的暴力（例如，在其执行视频中）编织在一起，成功地促进了与主流伊斯兰教（即全球圣战的意识形态）有关的不同的信念和解释系统。对于诸如伊斯兰国（ISIS）这样的组织而言，这种创新的构架方法是前所未有的，将其与历史上的其他所有恐怖组织区

分开来，是其成功的全球激进化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 4.1 框架化方法与 ISIS 的意识形态

伊斯兰国（ISIS）正在基于四种主要的意识形态支柱进行一场思想战：（1）整体的基本概念；（2）乌玛的乌托邦理想；（3）全球圣战的概念；（4）死亡精神。

如今，这种思想战主要是通过大规模的社交媒体活动在营销领域进行的。相比军事胜利或恐怖袭击，伊斯兰国（ISIS）建立和维持大规模在线业务的策略最终对其长期成功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它标榜自己，包装自己的愿景，最重要的是，它构建圣战主义意识形态的方式，远比其他军事行动重要得多，可以塑造人们的观念和想法，在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助长激进化。

45

#### 4.2 ISIS 独特的“黑白”策略

伊斯兰国（ISIS）的视角与对手所呈现的世界不同，这种视角基于狂热和二分法的意识形态，将世界分为“善良”和“邪恶”阵营，因此，对所有不属于全球圣战运动的人使用致命暴力进行了合法化。因此，它制定了独特且创新的消息传递策略，我将其称为“黑白”框架化策略。

这一策略就像一个镜头，通过这一镜头，伊斯兰国（ISIS）塑造了其受众的信仰和观念，分化了他们的支持，并煽动他们的激进化。它包含了框架化技术的组合，其中两种我在本文中首次进行了识别和定义：

- 武装/和平框架化——使用隐喻、图像、符号和短语以军国主义、暴力方式（例如“杀戮”、“伤害”或“破坏”）或和平方式（例如“信任”、“希望”或“建设”）描绘事件和情况，从而促进好战的话语体系并促进暴力行为（例如，呼吁进行恐怖袭击），或者促进和平的话语体系和行动（例如呼吁抵制暴力）。

- 威胁框架化——使用视觉和文字短语传达威胁和威慑感，以便在不同的目标受众中促进和实现各种目标。使用威胁框架化的目的是说服个人和/或集体改变他们的信念或立场，因为他们害怕产生负面的后果，并且可以为政治意识形态议程带来概念上或实践上的支持。

此外，伊斯兰国（ISIS）计划了另一种普遍流行的框架化技术：

- 受益/损失框架化<sup>46</sup>——使用否定/肯定短语来描绘以消极/积极方式采取的某些政策或行动，可能导致对“客观”现实的偏见和/或错误认识，从而使公众舆论朝有利的方向倾斜。研究表明，有目的地用负面的术语来形容不良行为的结果比使用正面的术语来描述理想的结果具有更大的影响。

伊斯兰国（ISIS）的框架化策略还包含一些反复出现的政治和宗教叙事和主题，包括把伊斯兰教描绘成一种征服的力量；假定伊斯兰教有义务消灭异教徒；提及历史事件，例如对十字军东征的战争；以及心理和情感主题，例如爱与安全感和羞辱与痛苦的对比。

#### 4.3 ISIS 思想战的四个组成部分

##### 4.3.1 整体概念

伊斯兰国（ISIS）思想战的第一部分，也是其黑白策略的基础，对伊斯兰教的认主学（Tawhid）原则、真主的一体作出了解释，它对其事业的整体性有着不可动摇的信念<sup>47</sup>。根据这种解释，除自身之外的任何意识形态、价值观或身份都应当予以消除，而那些加入其行列并支持其意识形态的人（圣战分子）是唯一真正的穆斯林。

为了宣扬这一理念，伊斯兰国（ISIS）谨慎地使用非常基本的二元对立，例如爱-仇恨、同情-厌恶和安全-恐惧，以简单的方式介绍其圣战思想。它为个人提供了属于“真”穆斯林

或“假”穆斯林或异教徒的二元对立选择。前者——接受并奉行圣战者世界观——构成其世界地图的“白色”面，而后者则是“黑色”面，被定为异教徒，由于宗教义务应将予以杀害。

伊斯兰国（ISIS）在其视觉营销活动中将整体概念与威胁框架化和好战框架化相结合。它毫不犹豫地向追随者和反对者展现最极端、最震惊和最恐怖的图像（例如活活烧死一个约旦飞行员），没有任何筛选或限制，以此来激发最强烈的情感反应——无论是恐惧、恐怖，或是嗜血、以暴力取乐。

伊斯兰国（ISIS）以整体概念为基础，传达了专制主义的概念和强烈、明确的信息，以彰显其实力，赢得信誉和知名度，并维护其宗教权威和合法性，从而促进激进化。通过这一战略，伊斯兰国（ISIS）寻求维护其代表全球穆斯林社区解释伊斯兰教并宣扬圣战的权利，同时将所有其他解释和理解视为与“真实”伊斯兰教的腐败背离。

### 4.3.2 乌玛的乌托邦理想

自七世纪以来，乌玛的想法便已成为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意识的一个 DNA，作为穆斯林集体的乌托邦理想，伊斯兰国（ISIS）竭力对这种想法进行激进化的解释，声称伊斯兰世界在当下是作为一个真实的伊斯兰哈里发统治建立的。伊斯兰哈里发是乌玛作为一个“真正的信徒社区”的真实体现，是一个具有“纯粹”伊斯兰身份的统一集体，仅受伊斯兰教法约束。

根据乌托邦的理想和框架化战略“白色”的一面，伊斯兰国（ISIS）结合使用了受益框架化和和平构架化来强调乌玛的乌托邦理想。它把乌托邦的叙事嵌入到其视频中，比如向工人展示哈里发统治路线上的工人，他们提供医疗服务，甚至在摩苏尔经营一家五星级酒店，其目的是激发其追随者，并赋予他们在一个有意义的现实世界中的归属感、团结感和参与感。

同样地，伊斯兰国（ISIS）选择使用生动的色彩、明亮的灯光效果和振奋人心的音乐来描绘伊斯兰国家的日常生活，以增强哈里发的形象，即作为一个拥有有效政府和警务的平稳运转的社会，一个远离战争和残暴的美好的地方，远非敌人所形容的那般。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试图树立对其乌托邦伊斯兰国的积极印象，并促进激进化，增强实力，为其教义赢得信心和合法性。

与对哈里发作为一个胜利和成功实体的正面形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伊斯兰国（ISIS）利用损失框架化来抹黑阿拉伯领导人和政权，并以“黑色”色调描述了世俗阿拉伯民族国家生活中的消极方面。它认为这种存在本身就是异端。它刻意使用负面的灯光效果和暗淡的色彩来描绘这些国家穆斯林的生活，并反复使用诸如对穆斯林人民的“压迫”、“忽视”和“剥夺公民权利”等意味深长的词汇，同时突出其政治领袖的腐败和腐败影响。

伊斯兰国（ISIS）同时以各种方式结合受益框架化和和平框架化，以突出伊斯兰哈里发的社会社区方面，将其描绘成一股统一的力量，汇集了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的真正的穆斯林信徒，其中“ISIS 伊斯兰”是将他们结合在一起的粘合剂。实际上，对哈里发的统一特性的关注使得伊斯兰国（ISIS）能够创建组内身份，并将其描绘为全球成员和追随者的“家”（尽管是虚拟的家），从而提供一种意义、归属感和团结感，让他们有被接纳、被爱和被保护的感受。

这与“黑色”一面形成鲜明对比，在“黑色”一面，伊斯兰国（ISIS）使用损失框架化和威胁框架化的组合来突出显示穆斯林世界内部的分歧，呈现了阿拉伯和西方国家穆斯林生活的反乌托邦形象，他们需要忍受疏远和压迫，像是生活在“自己土地上的陌生人”。这些场景当然是用深色表示的，昏暗的灯光和低沉的音乐，强化了这样一种信息，即这些可怜的不幸灵魂是无助的，是他们所处环境的受害者，这与哈里发强大而活跃的英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 4.3.3 全球圣战的概念

伊斯兰国（ISIS）认为圣战是一场全面的、长期的、不妥协的、在不同的战线上同时进行（包括现实世界和网络世界）全球军事斗争，其目的是摧毁现有的政治和宗教世界秩序，建立一个全球性的伊斯兰国家。它认为，只有通过彻底改变穆斯林的公众意识，完全否定和拒绝所有外来影响、意识形态和观念，以及完全遵守其对伊斯兰教法的“权威”解释，才能恢复伊斯兰教的力量和地位。

根据其黑白策略，伊斯兰国（ISIS）经常使用受益框架化以及情感上的伊斯兰符号和隐喻来说明圣战的目的不是征服领土和利用物质资源或实现国家、组织或个人目标的帝国主义斗争，而是捍卫伊斯兰教原则和思想的斗争，以及反对与圣战主义解释相悖的外来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有鉴于此，它以“白色”一面的身份作为伊斯兰的唯一保护者，是伊斯兰教逊尼派最真实形式的真正承载者，与温和的穆斯林和所有其他群体的“黑色”一面恰恰相反。

伊斯兰国（ISIS）特地使用损失框架化和好战框架化的组合来强调敌人造成的杀戮和伤害的范围，尤其是对无辜儿童。它使用鲜明的图像和煽动性的否定性语言（例如“毁灭”和“种族灭绝”）来谴责敌人并破坏其合法性，同时也加强了其追随者对伊斯兰国（ISIS）的认同和声援并使其行动合法化。

的确，伊斯兰国（ISIS）的黑白信息经过精心设计，证明了其呼吁全球圣战的合法性，将其作为一种义务呈现出来，同时将其殉难行动和恐怖袭击定性为复仇和自卫行为。它使用威胁框架化和诸如“审判日”之类的神学术语将叙利亚的武装斗争描述为真主与其敌人之间的世界末日对峙。该组织故意夸大了“伊斯兰敌人”所构成的威胁，将其斗争表现为善与恶的终极斗争。通过灌输诸如“十字军”和“世界末日的斗争”等世界末日的伊斯兰教主题，强调世界末日的即将来临以及“真正的”穆斯林与异教徒之间不可避免的对抗，伊斯兰国（ISIS）营造了世界末日的气氛，给人带来焦虑、紧迫感和恐慌感。

伊斯兰国（ISIS）从支持圣战中获得好处的独特方式，旨在促进激进化，鼓励人们认同其僵化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因此，它利用受益框架化将其教义描绘为获得个人意义、目的和尊重以及强烈安全感的一种手段。此外，它采用了威胁框架化，并巧妙利用可能出现的最极端、最令人震惊和恐怖的图像（包括斩首和处决的视觉图形）来挖掘观众内心的最深的恐惧、希望和欲望，从而为自己的圣战主义服务。该战略旨在激发最强烈的情感反应——不论是敌人之间的恐惧和畏惧，或支持者之间的对暴力的嗜好和热衷。

#### 4.3.4 死亡精神

伊斯兰国（ISIS）呼吁对死亡进行全面战争，将其描绘成一种崇高的价值，是捍卫永恒真理并清除伊斯兰教内部和外部异教徒的最终方式。该组织对塔克菲理的伊斯兰原则提供了极端主义的解释<sup>49</sup>，将任何被认为是异教徒的人逐出教会，并且坚持认为任何不是真正信徒的人（甚至那些认为自己是虔诚穆斯林教徒的人）都可以而且应该被处死。因此，伊斯兰国（ISIS）的“忠实信徒”非常信奉死亡精神，体现在殉难行动、致命的恐怖袭击和残忍的杀戮。<sup>50</sup>

伊斯兰国（ISIS）巧妙地将受益框架化和好战框架化结合起来，将杀人和被杀的意愿描绘成权利和力量的表达。它对死亡精神的美化和它的全部原则（以及对其他民族和价值观念的仇恨）结合在一起，表达了对人类生命价值的侮辱和蔑视，将其描绘成一种外来的、异教徒的概念。作为其黑白策略的一部分，伊斯兰国（ISIS）强调了其“真正的信徒”与“伊斯兰教徒的仇敌”之间的鸿沟，并对其神圣的死亡精神与西方赋予生命价值的神圣精神进行了对比。因此，对死亡的热爱被描述为“白色”，比对死亡的恐惧更强大，而这体现了“异教徒”的特征，被描述为“黑色”。

伊斯兰国（ISIS）一再强调死亡精神作为身体和军事力量的来源，和追随者对他们的事业的坚定信念和意义感和满足感，所带来的好处，因此强调了信仰的力量以及体现在他们身

上的对权力的信仰。

## 5.使用框架化方法彻底根除 ISIS 的思想

在上一章中，我解释了伊斯兰国（ISIS）如何在激进化的努力中取得巨大成功，它采用了极端主义的黑白概念方法，并在圣战主义意识形态的四个主要元素中，即整体的基本概念、乌玛的乌托邦理想、全球圣战的概念和死亡精神，使用特定的框架化技术。因此，去激进化的努力——使 ISIS 的目标受众从极端价值观和信念转移到更为温和的主流观念——需要解决这里的每一个要素，并采用不同的框架化技术，以对抗伊斯兰国（ISIS）强大的消息传递的吸引力。

这种不同框架化方法所基于的逻辑是，假设意识形态和消息传递在将个人引向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方面起着主要作用，而激进信息、价值观和思想的吸引力可以通过培养不同的思维方式进行削弱，这种思维方式植根于多样性的价值（与极端主义倾向相反，极端主义倾向不容忍多样性，不接受妥协）。<sup>51</sup> 因此，从支持/参与恐怖主义到打击恐怖主义的转变是通过采取开放的态度和复杂的思维来实现的<sup>52</sup>，而不是简单的黑白思维<sup>53</sup>。

提出强有力的、可替代的价值观框架，例如社区、团结、和平与宽容以及对宗教和意识形态宗旨的有根据的、有说服力的温和的主流解释，是促进丰富话语的基础，这种话语可以对抗激进化的价值观和信仰。<sup>54</sup> 这种话语抵消了极端主义叙事中固有的仇恨和两极分化，增强了听众抵抗极端主义信息吸引力的能力。

在本节中，我通过这四个主要因素，提出了伊斯兰国（ISIS）对伊斯兰教价值观和当前现实的解释的替代方案，并提出了可能会有效促进这些解释和打击伊斯兰国（ISIS）圣战信息的框架化方法。为此，我采用了一个新的概念框架，这一框架结合了上面描述的框架化技术，以及我在这里首先介绍的两个新的和创新的框架化技术：

- 符合性/不符合性框架化——使用各种文本和视觉短语、符号和隐喻来描述个人行为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群体或社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因此，我们可以把“团结”、“归属感”和“效法”等此类术语归属为符合性框架化，而把诸如“独特性”、“个体性”和“叛逆”之类的术语归属为不符合性类别。

- 传统/革命性框架化——使用各种图像、符号、隐喻和短语（例如“老式的”、“怀旧的”和“连续性”）来描述与一系列情况、感知以及行为有关的传统取向；或者，使用诸如“新式的”、“未来主义”和“改革”之类的术语来描述革命性取向。

### 5.1 圣战者意识形态的替代观念

伊斯兰教自成立以来因两个主要阵营之间的内部斗争出现了分裂：多数穆斯林世界所属的逊尼派伊斯兰教徒（约占穆斯林的 85–90%）和少数什叶派伊斯兰教徒营地（约 10–15%）<sup>55</sup>。逊尼派内部也存在冲突，一方是激进的伊斯兰教（由 ISIS 及其前身基地组织等组成的全球萨拉菲主义圣战运动领导），另一方是温和的主流的伊斯兰教（受民主和西方价值观影响）。缺乏一个有组织的、统一的宗教权威和对伊斯兰教多种解释的共同存在，导致了富有争议的意识形态和观念（一场思想的战争），即到底哪种解释才是正确的，助长了关于“纯正”的伊斯兰教权威、合法性和领导的争论和冲突。<sup>56</sup> 可以说，自最早的穆斯林时代以来，就存在这样的争论，争论的立场从温和的主流观点到极端狂热的意识形态，例如圣战主义和“塔克菲理主义”。<sup>57</sup>

鉴于对伊斯兰教的各种认知和理解是整个穆斯林世界（包括 18 亿穆斯林）的共同特征，所以除了伊斯兰国（ISIS）的极端主义的信念，也有许多温和的信念。出于本文的目的，我将介绍其中一种主流解释（“多元方法”），并说明如何使用各种框架化技术来促进去激进化。如上所述，重点是伊斯兰国（ISIS）思想战的四个主要要素。

## 5.2 重构思想战的四个组成部分

### 5.2.1 整体概念

ISIS 的二元世界观尽建立在对伊斯兰教法的极端主义解释，拒绝且使得任何其他的宗教解释失去了合法性，包括伊斯兰教逊尼派的其他形式以及世俗的意识形态、信仰、价值观、规范和实践，所有这些都指定为“异教徒”。相比之下，大多数主流穆斯林世界的特点是多元化，其中对伊斯兰教圣典的多种解释以及合法身份、意识形态和思想的变化已经共同发展繁荣了十四个世纪。

通过框架化挑战总体概念：

- 传统框架化可以用来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过去的 1400 年中，绝大多数的穆斯林都遵循这种多元化的方法，这给予了个人信徒很大的空间，去选择其宗教灵感、指导和教育。

- 受益框架化呈现了一个宽容主流的伊斯兰教，是恩典、福祉、安宁和幸福的给予者，除了宗教穆斯林身份之外，强调具有多种民族、种族和文化身份的好处，并对此进行了补充，帮助人们拥有丰富而有意义的生活。

- 相比之下，伊斯兰国（ISIS）的整体方法应当采用损失框架化进行构架，以强调对伊斯兰进行苛刻和同质解释的弊端，这种解释否定并拒绝了观念和自我的任何演变和发展。

### 5.2 乌玛的乌托邦理想

伊斯兰国（ISIS）对乌玛宗教理想的解释与普遍的伊斯兰信仰相抵触，根据伊斯兰国（ISIS）的解释，哈里发的基础是未来的乌托邦目标，取决于安拉的意愿，而不能人为地加快。此外，没有统一的合法权威、普遍的政治实体或框架来团结世界上的 18 亿穆斯林，也没有就乌玛作为现实世界治理结构的宗教政治身份达成共识。<sup>58</sup> 这种情况与世界上不同穆斯林人口国家和地区特征并存，构成了目前由多个君主制、共和国和独裁统治的实体的基础。

通过框架化促进对乌玛理想的不同解释：

- 符合性框架化可用于将乌玛框架化为“普遍宗教共同体”，是伊斯兰和伊斯兰意识 DNA 的一部分，并强调其社区社会方面，被世界各地的穆斯林所接受，可以超越他们的民族、文化和种族差异。此外，革命性的框架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在线平台和虚拟社区来强调发展和体验乌玛的可能性，使乌玛成为一个热情而充满活力的跨国社区。（这是穆斯林社区在最近的冠状病毒流行病期间，在全球范围内为克服社交距离的局限所做的一个努力。）乌玛的温和主流伊斯兰教，被绝大多数穆斯林世界所接受，而它的正面的形象可以抵消伊斯兰国（ISIS）对这一理想的极端主义解释。

- 同样地，可以使用传统框架化来强调以下事实：在整个伊斯兰历史中，乌玛作为现实世界的政治实体的想法从未实现过，并强调指出，自 1400 年前伊斯兰教诞生以来，乌玛一直是伊斯兰教的未来主义的乌托邦目标，被整个穆斯林世界所接受。

- 相比之下，损失框架化可用于呈现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教哈里发统治中真实的、实际的反乌托邦生活本质，从而强调了伊斯兰国（ISIS）的谎言和操纵，揭穿了其对乌玛理想的解释和实现。

- 我们可以利用同样的技术来表示哈里发的瓦解，从而证明它不是由神圣秩序建立的，而是其领导人的物质欲望和他们对政治和宗教权威与权力的热衷的结果。通过这种方式，损失框架化可以用来说明伊斯兰国（ISIS）对乌玛的解释是非法的，并谴责该组织本身是非伊斯兰教，是腐败和十分残酷的。

### 5.2.3 全球圣战的概念

在最近的几个世纪里，已出版大量关于圣战的文献，但是对于这一多方面的宗教教义，

这从字面上意味着“斗争”，还没有达成牢固的共识（为了阿拉）。<sup>59</sup> 伊斯兰国（ISIS）对这一概念的解释遭到绝大多数穆斯林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圣战是个人为了增强自己的信仰而进行的内部斗争。

通过框架化促进对乌玛理想的不同解释：

- 伊斯兰教的主流方法解释说，信仰是一种美德，是所有个人和生活各个方面的宝贵基础，也是成为“模范穆斯林”的关键组成部分。受益框架化可以用来强调从坚定的信念所获得的好处，即自我实现、力量和内心的平和。传统框架化可以用来强调贯穿整个伊斯兰历史的信仰的重要性。

- 损失框架化可用于伊斯兰国（ISIS）对圣战概念的解释，以强调其破坏性激进分子倾向的有害方面，并强调相比（武装/胁迫）行动对信仰的偏爱，为伊斯兰法统治的社会造福的唯一解决办法。除此之外，威胁框架化还可以用来将伊斯兰国（ISIS）的做法定位为非法的，是对伊斯兰教和世界各地穆斯林的直接威胁。

- 通过结合上述的框架技术，人们可以解释伊斯兰国（ISIS）不仅降低了伊斯兰信仰的重要性，而且还招募了（并赋予了突出的作用）对圣战（作为一种伊斯兰教价值观（在个人层面，宗教意义上）没有真正认识 and 理解的伊斯兰新成员，并错误地将其描绘成忠实的穆斯林和“真正的信徒”。

- 与伊斯兰国（ISIS）的做法相反，和平框架化和传统框架化可以用来代表一种开放的选择，它将伊斯兰视为一种和平的宗教，它使用和平的方式，合法手段而非强迫和武力，实现政治和社会变革。

- 伊斯兰国（ISIS）的好战方法是由其领导人制定的，是一种旨在保护伊斯兰教法的防御斗争。可以通过坚持捍卫伊斯兰教免受外部威胁的观点来应对这种情况，但是要使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呈现。和平框架化可以用来强调坚信伊斯兰教的重要性，因为伊斯兰教是保护和保证伊斯兰教的连续性的最有效方法。此外，可以采用损失框架化法对伊斯兰国（ISIS）进行合法化，并强调它在语言层面如何构筑圣战的概念与它在实际中的实际实现之间的差距。

#### 5.2.4 死亡精神

作为对圣战狂热解释的一部分，伊斯兰国（ISIS）的死亡精神遭到绝大多数穆斯林的强烈反对。它的激进主义不仅对全世界所有的穆斯林构成了直接威胁，它的解释也与公认温和的主流伊斯兰教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于绝大多数穆斯林来说，一个真正的信徒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从事各种各样社会实践，做出奉献，同时尊重人类和他人的生命价值。这被认为是伊斯兰的真正精神，而伊斯兰国（ISIS）的解释和行动违反了这种精神。

通过框架化提倡替代死亡精神：

- 在整个伊斯兰教历史上，温和的主流观念提高了作为“正统”穆斯林的生活价值，鼓励投资艺术、科学和人文科学，作为繁荣的伊斯兰文明的一部分。对于一个忠实的穆斯林来首，自我实现意味着按照伊斯兰教法，过充实而有意义的宗教生活。可以使用受益框架化和传统框架化来促进这种方法及其优点。

- 相比之下，应当结合使用威胁框架化和损失框架化来构架伊斯兰国（ISIS）的死亡精神，以强调失去生命的悲剧和失去过“真信徒”生活的机会。同样地，这种组合可以用来强调伊斯兰国（ISIS）对穆斯林世界的负面影响，它给数十万人造成的难以估量的痛苦，以及战争给物质、政治和社会基础设施造成的灾难性破坏。

## 六 结论

极端意识形态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对世界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这种扩散是由多种政治、社会、技术和其他背景因素和情况造成的。特别地，社交媒体的兴起及其对社交互动的巨大影响以及人们对思想和信息的接触，在激进化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在温和的主流伊斯兰教与极端圣战主义之间的思想战中，我们需要开发并应用有效的去激化工具作为改善全球安全的手段，这一点至关重要。

正如解释的那样，伊斯兰国（ISIS）巧妙地运用了框架化工具，使得全球数以百万计的人激进化，将其抽象的意识形态转化为有形的、具体的“产品”，供不同地区和文化的群众享用。框架化涉及选择感知现实的某些方面，使它们在交流中更加突出，以促进特定的解释。它就像一个“话语透镜”，因为“在线交流互动构成了话语实践，作为一种机制，让公众通过分享和讨论社交媒体内容，甚至通过赋予经验意义，来塑造和构建他们自己的观点。<sup>61</sup>通过计划这一镜头，可以塑造听众的看法，使他们的支持出现两极分化，并推动他们意识的转变和改变。

在本文中，我介绍了一个概念框架，使用框架化来对抗伊斯兰国（ISIS）的圣战信息并推进去激进化工作。并解释了如何使用各种框架技术来突出伊斯兰教主流思想的吸引力，并使极端主义的解释和意识形态失去合法性，从而帮助伊斯兰国（ISIS）的圣战者意识形态转向其他更温和的伊斯兰解释。这些见识和技术不仅应当引起全球穆斯林机构、媒体和社区的关注，而且应当引起许多国家在其本国境内与激进化作斗争的政府和情报部门的关注。

为了在不同的地域和文化中提出这一概念框架的具体实施方案，并在框架方法的基础上使用其他的元素予以丰富，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描述的框架化方法是否可以用于处理其他的意识形态，也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话题，具有取得重大成果的巨大潜力。

当然，应该指出的是，在与极端主义、圣战和恐怖主义的进行全面斗争的背景下，本文提出的概念框架仅构成使用媒体和营销策略的其他各个重要方面——例如社会、政治、经济和技术领域——所需要的总体对策的一部分。我计划在以后的文章中加以讨论。

## 参考文献

1.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全球预防暴力极端主义》（2017年）。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259485>
2. Owen Frazer 和 Christian Nünlist: “反暴力极端主义的概念”，CSS 安全政策分析，第 183 号（2015）：1-4。
3. William Stephens, Stijn Sieckelinck 和 Hans Boutellier : “预防暴力极端主义：文献综述”，《冲突与恐怖主义研究》（2019年）：1-16。
4. Samuel J. Leistedt: “恐怖主义的行为方面”，国际法医学 228（1-3）（2013）：21-27。
5. Arie W. Kruglanski, David Webber 和 Daniel Koehler 《激进的旅程：德国新纳粹分子向边缘和背面的航行》（牛津大学出版社，2018年）； Ryan Scrivens, Gareth Davis 和 Richard Frank: “测量激进的右翼张贴行为的演变”，偏差行为 40，第 2 期（2020）：216-232
6. 个人作家: “ISIS 妻子关于浪漫和‘难’的博客”，阿拉伯新闻 2014 年 9 月 18 日。
7. 西德尼·琼斯（Sidney Jones）: “印尼泗水和 ISIS 家族”，《口译员》，2018 年 5 月 15 日。
8. 参见 “斯里兰卡袭击：与爆炸案有关的‘国际网络’” BBC 新闻，2019 年 4 月 22 日。
9. Mohammed Hafez 和 Creighton Mullins: “激进主义之谜：本土极端主义经验方法的理论综合”，《冲突与恐怖主义研究》 38，第 11 期（2015）：958-975；彼得·R·诺伊曼（Peter R. Neuman），“激进主义的麻烦”，《国际事务》第 89 期，第 1 期。 4（2013）：873-893；安东尼·理查兹（Anthony Richards），“从恐怖主义到激进主义再到‘极端主义’：当务之急或失焦”，《国际事务》 91，第 2 期（2015）：371-380；亚历克斯·P·施密德（Alex P. Schmid），“激进化，反激进化：反激进主义的概念讨论和文献综述”，ICCR 研究论文（2013年）。
10. Walid Phares 《思想战：反对民主的圣战》（纽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2007年）；奥利维尔·罗伊（Olivier Roy），《圣战与死亡》：伊斯兰国家的全球诉求（伦敦：赫斯特，2017年）。
11. Mohammed Hafez 和 Creighton Mullins: “激进主义之谜：本土极端主义经验方法的理论综合”，《冲突与恐怖主义研究》 38，第 11 期（2015）：958-975；彼得·R·诺伊曼（Peter R. Neumann），“激进主义的麻烦”，《国际事务》第 89 期，第 1 期。 4（2013）：873 - 893。
12. Anat Hochberg-Marom 《2019 年营销恐怖的“艺术”》。
13. Anat Hochberg-Marom: “基地组织与其全球营销策略”，网络安全建模：途径，方法，策略-北约和平与安全科学丛刊，第 59 期（2009）：109-113。
14. Arie W. Kruglanski, Michele J. Gelfand, Jocelyn J. Belanger, Anne Sheveland, Malkanthi Hetiarachchi 和 Ruhan Gunaratna: “激进主义和反激进主义的心理学：重要性探索如何影响暴力极端主义”，《政治心理学进展》第 35 期，增刊。 1（2014）：69-93。
15. 拉奎尔·达席尔瓦（Raquel da Silva），帕勃罗·费尔南德斯·纳瓦罗（Pablo Fernandez-Navarro），米格尔·贡萨尔维斯（Miguel M. Goncalves），卡塔琳娜·罗莎（Jotar Silva）和乔安娜·席尔瓦（Joana Silva）: “脱离政治暴力和反激进主义：叙事对话的视角”《冲突与恐怖主义研究》，43（2020）：431- 454。
16. Schmid: “激进化，去激进化，反激进化：概念性讨论和文献综述”。
17. Arie W. Kruglanski, Jessica R. Fernandez, Adam R. Factor 和 Ewa Szumowska, “暴力极端主义中的认知机制”，《认知》 188（2019）：116-123； Kruglanski 等。 “激进主义和反激进主义的心理学：意义探索如何影响暴力极端主义”。
18. 斯科特·阿特兰（Scott Atran）《与敌人对话：暴力极端主义，神圣的价值观以及对人

类的意义》(英国, 企鹅出版社, 2010年); Schmid “激进化, 去激进化, 反激进化: 概念性讨论和文献回顾”。

19. Anne Speckhard 和 Molly D. Ellenberg: “ISIS 自述: 招聘历史, 加入动机, 旅行, ISIS 的经历以及对时间的幻灭-分析 ISIS 返回者, 叛逃者和囚犯的 220 次深度访谈”, 《战略安全杂志》第 13 号。1 (2020): 82-127; Donatella Della Porta: “关于地下政治组织中的个人动机”, Donatella Della Porta 编辑, 《社会运动与暴力: 地下组织的参与》(Bingley: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1992 年), 第 3 至 28 页。

20. <https://www.internetworldstats.com/stats3.htm>

21. Rohan Gunaratna: “全球威胁预测” 反恐趋势和分析, 第 10 期, 第 1 号 (2018 年): 16。

22. 库玛·拉玛克里希纳 (Kumar Ramakrishna): “东南亚 ISIS 极端主义的发展: 其意识形态和认知特征以及可能的政策对策”, 《新英格兰公共政策杂志》第 29 期, 第 1 期 (2017): 1-22; Hochberg-Marom: 《2019 年营销恐怖的“艺术”》。

23. Kruglanski: “激进主义和反激进主义的心理学: 意义探索如何影响暴力极端主义”。

24. Kruglanski 等。 “暴力极端主义的认知机制”。

25. 布鲁斯·霍夫曼 (Bruce Hoffman), 《内部恐怖主义》(纽约: 哥伦比亚大学)

26. 凯瑟琳·希勒 (Kathrin Hille): “俄罗斯与激进化: 本土问题”, 《金融时报》, 2015 年 12 月 7 日。

27. 戴维·克劳奇 (David Crouch) 和海伦娜·本格森 (Helena Bengtsson): “卡车驶入斯德哥尔摩的人群, 炸死 4 人,” 《卫报》, 17 年 4 月 8 日, 17 日。

28. 乌兰·博托别科夫: “伊斯坦布尔恐袭后, 对中亚的介入没有多大澄清”, 外交官 2016 年 7 月 15 日。

29. 本杰明·穆勒 (Benjamin Mueller), 威廉·K·拉什鲍姆 (William K. Rashbaum) 和艾尔·贝克 (Al Baker): “恐怖袭击在曼哈顿杀死 8 人并造成 11 人受伤”, 纽约时报, 2017 年 10 月 31 日。

30. Hammad Sheikh, Angela Gómez 和 Scott Atran: “忠实演员模型的经验证据”, 《现代人类学》第 57 期, 2016 年第 13 期: 204-209。

31. 约翰·埃斯波斯托 (John L. Esposito) 《邪恶的战争: 以伊斯兰教的名义的恐怖》(纽约: 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Fawaz A. Gerges 《圣战者的旅程: 穆斯林内部的好战分子》(佛罗里达州奥兰多: Harcourt, 2006 年); 亚伦·泽林 (Aaron Y. Zelin): “伊斯兰国与基地组织之间为争取全球圣战运动霸权的战争”, 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 第 20 期, 2014 年第 1 期: 1-11。

32. Brynjar Lia 《全球圣战组织》的作者: “基地”组织战略家阿布·穆萨卜·苏里的生活 (纽约: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马克·萨奇曼, 《无领袖圣战: 二十一世纪的恐怖网络》(宾夕法尼亚州费城: 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33. Shiraz Maher 《萨拉菲圣战: 思想史》(纽约, 纽约: 牛津大学出版社, 2016 年); Hafez & Mullins “激进主义拼图”。

34. 迈克尔·利普卡 (Michael Lipka): “穆斯林和伊斯兰教: 美国和世界主要发现”, 皮尤研究中心, 2017 年 8 月 9 日。

35. Joby Warrick 《黑旗: ISIS 的崛起》(纽约: Anchor, 2014 年); 迈克尔·威斯 (Michael Weiss) 和哈桑·哈桑 (Hassan Hassan) 《ISIS: 恐怖之军内部》(纽约: 里根艺术出版社, 2015 年); 杰西卡·斯特恩 (Jessica Stern) 和 J·M·伯格 (J.M. Berger) 《ISIS: 恐怖国度》(纽约: 哈珀·柯林斯, 2015 年); Will McCants, 《ISIS 启示录: 伊斯兰国的历史, 战略和世界末日的愿景》(纽约: 圣马丁, 2015 年)。

36. 布里吉特·纳科斯 (Brigitte Nacos) 《恐怖主义与媒体》。从伊朗人质危机到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 (纽约: 哥伦比亚大学, 出版社, 1996 年); 布鲁斯·霍夫曼 (Bruce Hoffman) 《内部恐怖主义》(纽约: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David Altheide: “恐怖主义程式设计”, 《恐怖主义批判研究》第 2 期, 第 1 期 (2009 年): 65-80; 西蒙·莫林·弗里斯 (Simon Molin Friis): “超越我们见过的一切”: 斩首视频和在与 ISIS 作战中暴力的可见性, 《国际事务》91, 第 4 号 (2015): 725-746; 西蒙·莫林·弗里斯 (Simon Molin Friis): “斩首, 焚烧, 钉在十字架上, 压碎”: 将伊斯兰国公开展示的暴力理论化。欧洲国际关系杂志 2492, (2018): 243 - 267; Fahmy Shahira (编辑)《媒体, 恐怖主义与社会》。数字时代的观点和趋势 (费城: Routledge, 2019)。

37. 框架的概念基于这样一个原则, 即我们的选择会受到不同措辞, 环境和情况的选择方式的影响 (Daniel Kahneman 和 Amos Tversky: “前景理论: 风险决策分析”, 计量经济学 47 (1979): 263-291)。

38. 在市场营销中使用框架法来影响公众舆论。恐怖主义的目标并不是要击败敌人 (尽管也是如此), 而是要传达信息, 吸引全世界的公众关注并影响公众意识。ISIS 在结合使用营销, 传播, 框架和恐怖主义方面取得了开拓性的成就, 从而对全世界的公众意识产生了巨大影响。

39. Robert Entman: “权力投射: 新闻, 舆论和美国外交政策的构架”, 传播, 媒体和舆论研究 (芝加哥: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威廉·加姆森 (William Gamson) 和安德烈·莫迪利亚尼 (Andre Modigliani): “关于核电的媒体话语和舆论: 一种建构主义的方法。”美国社会学杂志 95 no, 1 (1989): 1-37。

40. 罗伯特·恩特曼: “框架: 对断裂范式的澄清”, 《通讯》43 号, 第 4 期 (1993 年): 51-58。

41. Shanto Iyengar 和 Adam Simon: “海湾危机和民意的新闻报道: 议程设置, 启动和构架研究”, 《传播研究》, 第 20 期第 3 期 (1993 年): 365-383。

42. Quintan Wiktorowicz: “架构圣战: 内部架构竞赛与基地组织的斗争”, 《国际社会史评论》, 增刊 49. 12 (2004): 159-177。

43. Quintan Wiktorowicz “架构圣战: 内部架构竞赛与基地组织的斗争”。

44. ISIS 的媒体帝国和在线机构支持了一场高度复杂和精心策划的运动, 其中包括制作高质量的出版物和视频, 新闻稿和具有多媒体功能的网站, 包括音频, 图片, 海报和游戏。

45. 除了在社交网络上广泛使用数字营销和框架技术外, ISIS 还采用了传统的营销方法, 例如宗教讲座和清真寺讲道, 并利用社交和部落联系来招募新人。并利用社会和部落联系来招募新的支持者并扩大其全球影响力。Anat Hochberg-Marom《2019 年营销恐怖的“艺术”》。

46. Amos Tversky 和 Daniel Kahneman: “决策框架与选择心理学”, 《科学》, 第 211 卷 (1981): 453-458。

47. 对于伊斯兰国来说“认主学”原则与其说是神灵的统一, 不如说是安拉戒律的完整性和确定性, 因此伊斯兰教成为个人和集体身份的唯一基础, 指导着生活的所有领域和人类行为。

48. Olivier Roy 《全球化的伊斯兰: 寻找新的乌玛》(纽约: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49. Hussam S. Timani 《伊斯兰思想中的叛教者》, (列克星敦: 列克星敦书籍, 2017 年)。

50. 奥利维尔·罗伊 (Olivier Roy) 《圣战与死亡》: 伊斯兰国家的全球呼吁。

51. Putra Idhamsyah Eka, Erikha Fajar, Arimbi Reisa Suci 和 Rufaedah Any: “增加印尼定罪的恐怖分子的综合复杂性”, 《社会心理学与社会》, 第 9 期 2 (2018): 35-45。

52. Gideon Lucian Conway, Laura Jandelle Gornick, Shannon Houck, Kirsten Hands

Towgood, Conway 和 Kathrene R. Conway: “激进团体言论的隐藏含义: 综合复杂性和恐怖主义”, 《不对称冲突动态》第 4 期, 第 1 期。 2 (2011): 155-65

53. 社会心理学研究发现, 侵略和暴力行为与简单而封闭的思维有关, 人们倾向于坚持自己的严格认识。参见 Monroe A. Bruch, Michael McCann 和 Carol Harvey: “A 型行为和社会冲突信息的处理”, 《人格研究》第 25 卷第 4 期 (1991): 434-444。

54. Syamsul Arifin: “印尼的伊斯兰宗教教育和激进主义: 通过加强生活价值观教育来消除激进主义的战略”, 《印度尼西亚伊斯兰与穆斯林社会杂志》第 1 期 (2016 年第 6 期): 93-126。

55. Phare: “思想战: 圣战, 反对民主”; Maher, “萨拉菲圣战: 思想史”。

56. Maher: “萨拉菲圣战: 思想史”; Zelin: “伊斯兰国与基地组织之间为全球圣战运动至高无上的战争”。

57. Lewis Bernard, 《伊斯兰危机: 圣战与邪恶恐怖》(纽约: 兰登书屋, 2004 年)。Quintan Wiktorowicz ““萨拉菲运动剖析”《冲突与恐怖主义研究》 29 (2006): 207-239。奥利维尔·罗伊 (Olivier Roy) 《全球伊斯兰教: 寻找新的乌玛》。

58. Lewis Bernard, 《伊斯兰危机: 圣战与邪恶恐怖》。奥利维尔·罗伊 (Olivier Roy) 《全球化的伊斯兰: 寻找新的乌玛》。

59. Kepel 《穆斯林思想之战: 伊斯兰与西方》。莉亚-全球圣战组织的建筑师: “基地”组织战略家阿布·穆萨卜·苏里的生平。

60. Esposito, 邪恶的战争: 以伊斯兰名义的恐怖。

61. Chiara Valentini, Stefania Romenti 和 Dean Kruckeberg: “社交媒体关系动态中的语言和话语: 由交际构成的视角”, 《国际传播杂志》 10, (2016): 4055-4073。

